



郑玄《三礼注》《毛诗笺》 同源词研究

Researches on Cognates
in Zheng Xuan's San Li Zhu and Mao Shi Jian

王浩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玄《三礼注》《毛诗笺》 同源词研究

Researches on Cognates
in Zheng Xuan's San Li Zhu and Mao Shi Jian

王浩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同源词研究/王浩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1852-3

I. ①郑… II. ①王… III. ①《诗经》—同源词—研究 ②《周礼》—同源词—研究 ③《仪礼》—同源词—研究 ④《礼记》—同源词—研究 IV. ①I207.222 ②K224.06 ③K892.9 ④H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249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30 mm×980 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策划编辑: 宋旭景

责任编辑: 齐琳 李娟娟

美术编辑: 李向昕

装帧设计: 包丹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喜闻王浩老师的大作即将付梓，衷心祝愿该书能得到更多同行的关注。

在语言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形与音是义的载体，义是语言文字的内涵。基于此，传统语源学建立了音与形两维判定语义的标准。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从语言文字的产生过程去探索，音、形与语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联系是必然的，世界上就不可能产生成百上千种语言文字了。这种语言文字的现实，促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语言文字形成的决定性原因是约定俗成。既然约定俗成是决定性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研究约定俗成所需要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研究先民之间的共识，因为没有共识是不可能约定俗成的。而共识的形成又必然受到民族的认知、心理、文化、风俗、水土甚至世界观的影响，现代语源学把研究的触角深入这一领域是个可喜的进步。这本《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同源词研究》力图建立一个语言文字形音—认知—文化—哲学同源论证模式。这种研究无疑是对传统语源学的一大发展。

当然，认知—文化—哲学远不如语言文字音义那么切实，研究起来必然会遇到研究者不同认识的误导，这就需要研究人员注重借鉴前人的训诂成果，尽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意见，从而把结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愿我们共同努力发展现代语源学。是为序。

马恒君

2017年2月

河北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汉语词源研究现状及新思考	(5)
第一节 当今汉语词源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5)
第二节 汉语词源研究诸问题的新思考	(10)
第三节 寻找汉语词源研究新的突破点	(14)
第二章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基础	(16)
第一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学术背景	(16)
第二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学术基础	(29)
第三章 郑玄的语言观与注笺词语探源实践	(32)
第一节 郑玄的语言观	(32)
第二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对象	(36)
第三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范式	(49)
第四章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所系同源词考察	(64)
第一节 “认知—语言—文化—哲学”的同源词判定模式	(64)
第二节 郑玄注笺所系同源词论证	(66)
第三节 郑玄注笺所系同源词存疑及失误例分析	(239)
第五章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总结	(244)
第一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贡献	(244)
第二节 郑玄注笺词语探源的历史局限	(263)
第三节 郑玄在早期汉语词源学史上的地位	(271)
结 语	(275)

附录 郑玄注笺同源词一览表	(277)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311)

绪 论

早在先秦时期，受名学影响，古人对术数、政治类词语的命名之意高度关注，汉语词源探索由此兴起。至两汉声训，词语探源渐成扩大之势；魏晋宋明“右文说”和清代“音近义通”说使之进一步深化。至清代，以刘师培为代表的传统语源派也对语源研究有所贡献。至章太炎而异军突起，其代表作《文始》是“中国语源学史上里程碑性经典著作”^①，标明现代语源学的形成。其后的杨树达、沈兼士等也各有贡献。晚近，王力先生和陆王之学更把它推向新的科学研究阶段。

汉语词源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历了一个质的转变过程。表现在先秦词源探索的目的主要是阐释哲学主张或巩固封建秩序，到了西汉，毛亨开始将词源阐释的目的转向解释文献典籍中的疑难词语，从而使词源探索从哲学、政治的附庸中独立出来并运用于训诂学。毛亨之后，郑玄为解词而探源的目的更加明确且运用数量大量增加。在郑玄的影响下，其弟子刘熙编写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探求词语命名之意的专著《释名》。正如学界所评：“惜其（郑玄）一生劳于注述大典，而不遑条理故训，勒为专书。其弟子刘熙亲承音旨，得所指授，本其义例，述为《释名》。《释名》者，所以绍郑学余绪而发挥光大之者也。”^②可见，在汉语词源研究的发轫阶段，郑玄地位显赫。一方面，他继承、发展了前修时贤的声训，对其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声训之目的是揭示词源，探求事物的命名之意，将声训的运用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培养了写出“词源学性质的专著”大家刘熙。鉴于郑玄在中国词源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其训诂实践中的同源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就十分必要。

郑玄对汉语词源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郑玄首次对词的音义关系做出了明确解读，以此指导探源实践。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周礼注序》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

① 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7~18页。

② 张舜徽：《郑学丛著》，济南，齐鲁书社，1984，第423页。

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摭秘逸。”“原文字之声类”即推究、考察字音的类别，“考训诂，摭秘逸”即根据字与字之间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关系来辨明通假，考求词语深层、隐含、人不易知的意义。清人“因声求义”理论的雏形殆可追溯于此。他的这种以声音通训诂的理论主张，摆脱了汉字形体的束缚，从音义的内在关联探求词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凿破混沌、石破天惊之论。”^①尤为可贵的是他将其理论付诸整个训诂实践中。除了校正讹误、破除通假外，郑玄借助声音线索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探求词语的命名之意，即揭示词语的深层词源意义。

《论语注疏》之《述而》篇引郑玄语：“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后世黄侃先生所提“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②的观点亦与之相应。其中对“义全”的表述，说明郑玄已经认识到词义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是词直接指识的意义——词的表层所指义；一种是词内部蕴藏的意义——词的深层隐含义。“词的深层隐含义是抽象的，体现了人们关于认识对象的主观感受，因而往往寓于‘音’”^③，郑玄“正言其音”探求到的意义，包含着词的深层隐含义。

“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摭秘逸”“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体现了郑玄朴素的词源学思想、先进的语言学思想和理论。在当时，无疑是站在了学科前沿，具有开风气和引领潮流的作用，因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郑玄综合运用多种训释方式阐释词语的命名之意。

郑玄运用声训、陈述等方式阐释了大量词语的命名之意。张舜徽有云：“余平生考论文字训诂书之流别，以为汉代学者，本有二途：一主形训，许氏《说文解字》是也；一主声训，郑氏群经注疏是也。”^④在“因声求义”理论的指导下，郑玄对声训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即声训之目的是揭示语源，寻求词语的命名之意。在训诂实践中，他大量运用声训之法阐释词语的命名之意。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肆献裸享先王”，郑注：“裸之言灌，灌以郁鬯，谓始献尸求神时也。”又《周礼·天官·小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裸将之事”，郑注：“裸送，送裸，谓赞

① 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37页。

②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90页。

③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49页。

④ 张舜徽：《郑学丛著》，济南，齐鲁书社，1984，第423页。

王酌郁鬯以献尸谓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为饮，主以祭祀。”“裸”是一种宗庙祭祀仪式，君王酌郁鬯献给尸，尸把少许郁鬯灌注在地上，然后尝一尝，将郁鬯放在席前，以表示代父祖受祭。因为“裸”祭祀活动中，有灌酒于地的动作，所以郑玄认为“裸”命名的缘由来自于“灌”的动作。以“灌”释“裸”，是对裸命名之意的探讨。

《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覲，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我们试比较古代文献、许慎及其他训诂学家对“覲”的解释：《礼记·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覲。”《说文·见部》：“覲，诸侯秋朝曰覲，劳王事。”《尚书·舜典》：“乃日覲四岳群牧。”孔安国传：“覲，见也。”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古文献、许慎、孔安国都是从“覲”的词汇意义，即表层使用义对其进行解释，而郑玄是从“覲”的词源意义，即命名之意对其进行解释的。

除运用声训外，郑玄还运用陈述的方式阐明词语命名的理据，陈述即采用解说的方式，对命名理据进行解释说明。例如：

《仪礼·士冠礼》：“周弁、殷冔、夏收。”郑注：“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饰也。收，言所以收敛发也。”

《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

我们将研究的视线锁定于郑玄，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研究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同源词，能够凸显郑玄对词源学的贡献。

郑玄对中国经学的贡献是自汉代以来一直公认的，《后汉书·郑玄传》：“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自唐至清主要是对其注释进行整理和疏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郑玄词源学方面的贡献有所论述，但还是局部的、概括性的。

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要求，我们结合郑玄《三礼注》《毛诗笺》中大量阐释命名之意的训释材料，借鉴现代词源学理论，对郑玄在词源学方面的成就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丰富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并为汉语词源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实证材料。

研究汉语词源学史就要弄清汉语词源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只有把每一个时期的探源材料、探源方式研究清楚了，才能描绘出汉语词源学发展的真实轨迹。先秦到两汉，是汉语词源研究的发轫阶段。两汉又为这一阶段词源研究的高潮时期，毛亨、扬雄、许慎、郑玄、刘熙等小学家对汉语词源学都做出了贡献或产生了影响，都有必要作专人专题研究。剖析和总结郑玄在词源研究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会进一步丰富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本书对郑玄《三礼注》《毛诗笺》中的同源词进行论证，又为汉语词源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材料。

第三，分析郑玄词源研究的理论、方法，为汉语词源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郑玄有明确的探源意识，是在训诂实践中进行大量词语探源的第一人。郑氏提出的“就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掇秘逸”是清代“因声求义”“音近义通”词源学理论的雏形。郑氏对事物命名理据的探究和单音词声训式探源、复音词陈述式探源为刘熙乃至后世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另外，本书研究语料的取舍与择定如下：

郑玄一生，著述浩富。据杨天宇先生考证，其所注释经传、纬书、杂注等多达 32 部，然大多亡佚，有些仅能看到后人的辑本，到今天还保存完好的，只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四部书。所以，本书将郑玄词语探索的训诂实践锁定在《三礼注》和《毛诗笺》。

所用刻本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中的《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毛诗正义》，借鉴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三礼注》《毛诗笺》的词语探源进行考察。

第一章 汉语词源研究现状及新思考

汉语的词源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前科学词源学和科学词源学两大阶段。当今汉语词源研究正步入科学词源学的研究阶段。具体表现为，20世纪以来，汉语词源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研究的理论不断架构，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完善，汉语词源学正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展示着它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节 当今汉语词源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为了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词源学，当今汉语词源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词源学理论的建构和汉语内部同源词的系联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同时也是词源研究的难点。

一、词源学理论的建构

词源学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是促进词源学健康和迅速发展的前提。“理论的明确，能促进研究实践顺利进行；理论的僵化，会阻碍实践的前进步伐；理论的困惑，会导致实践的摇摆徘徊；理论的失误，也会将实践引向歧途。”^①因此，对词源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和澄清是当今词源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词语音义结合的理据性探讨

词语起源有无理据，一直是我国语言研究者探讨的问题之一。从先秦至汉代的声训看，训诂学家都在探讨和阐释词语音义结合的理据，刘熙在《释名·序》中明确提出：“夫名之与实，各有义类。”也就是说，在古代训诂学家的观念中，汉语词语音义的结合是有理据的。宋代右文说之“文”，清代段玉裁“凡某声皆有某义”和王念孙“音近义同”“音近义通”之“义”，都是对词语音义结合的理据的探讨。到近代，章太炎、黄侃、刘

^① 任继昉：《汉语语源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第15页。

师培、沈兼士、杨树达都主张“诸言语皆有根”^①，并将求语根与整理语族作为词源研究的主要工作。至现当代，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理据性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张永言：“新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一般说来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除了一些‘原始名称’以外，语言里的词大多是有其内部形式可寻，或者说有其理据可说的。”^②

许国璋：“当初民选择声音符号——可分离的、清晰的声音——去传递信息的时候，这一选择本身已经否定了语言和事物的‘自然结合’或‘自然联系’了。既然自然联系不存在，当然只有‘人为的联系’，人为的联系即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是理性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联系。”^③

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无论是原生词还是派生词，它们都有各自的理据。”^④

于海江《符号的任意性与词的理据》：“词是有理据的；符号的任意性和词的理据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于符号的自然属性来说的；后者是针对人在选择语言符号时的理性思维而言的。”^⑤

许光烈《汉语词的理据及其基本类型》：“事物的名称既然是人们‘规定’的，因而用什么词去称呼什么事物，总要有—定道理（理由或依据）。”^⑥

就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而言，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它与所表达的概念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就人在选择语言符号时的理性思维而言，语言符号与概念之间有理性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产物，人在选择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概念时，总是会受到语言或社会的制约。我们难以想象在一种语言内部，一堆任意选择的符号会构成语言。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些词找不出理据而否认理据的存在。语言符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其间有些词语丧失了理据在所难免。

（二）“音近义通”的探讨

“音近义通”是论证同源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有其客观的成因和适用的范围。“音近义通”是相对于词汇发展的派生阶段提出的。在词语的

① 章太炎：《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右文社，1915，第40页。

② 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

③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35页。

④ 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1页。

⑤ 于海江：《符号的任意性与词的理据》，《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⑥ 许光烈：《汉语词的理据及其基本类型》，《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派生阶段，同源词之间客观存在“音近义通”的现象。

“语言之变化有二：一、由语根生出之分化语；二、因时间或空间之变动而发生之转语。分化语者，音不变(没看到变化)而义有变。……转注(按当为转语)则义同而语为二。……要之，文字意义之增多，训诂之繁衍，不外分化语与转语二途：又不外以双声、叠韵为其变化之轨辙也。”^①也就是说，同源词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汉语词汇的历时孳乳产生同源词，一种是共时方言转语产生同源词。汉语词汇历时孳乳产生的新词，由于语言的简约性原则的制约，是在旧词的基础上音、形略加改变而来，新词与旧词“音近义通”。转语是指一个词在不同地域的语音变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词义相同，语音略变，即音近义同。

但古人对“音近”和“义通”并没有具体的表述。随着词源研究的深入，学界对“音近”和“义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何谓音近？依据何种标准判定音近？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关系是否可以用音近来表述？当今词源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词源研究的主流认为音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音近判定所依据的上古音系还有待完善。

徐通锵先生认为构拟上古音的学者“对音变的理解都局限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的一种方式中，思想上没有离散式音变、叠置式音变的观念，因而碰到这些音变方式的语言现象就显得缩手无策”，不能做到“不同类型的音变现象应该用不同的音变方式去解释”。^②

王宁先生认为：“‘音近’是一个模糊概念，什么叫‘近’，近到什么程度可以列入同源探讨的范围，都难以定出一个标准。”^③

王凤阳先生认为《同源字典》为“超方言的虚拟的古音构拟”“虚拟的音转规律”“不可能是科学的”^④；钟敬华则认为“语音标准模式”，用单一音系模式来解释古韵材料中的纷繁矛盾是“南辕而北辙”，“在根本原理上就存在着缺陷”。^⑤

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孟蓬生认为：“从同源词的实际派生现象来看，同源词的语音关系确

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05～206页。

② 徐通锵：《“阴阳对转”新论》，《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53页。

③ 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④ 王凤阳：《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第103、104页。

⑤ 钟敬华：《同源字判定的语音标准问题》，《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

实不限于相同和相近。”“同源词的派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反映在语音方面必然是声音的递转（直接音转和间接音转交替进行），因此要求所有同源词语音相近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导致同源词的大量遗漏。”^①

殷寄明认为：“‘音近’作为一个术语有两方面的缺陷。其一，过于笼统、含混。其二，不能确切地指称同源词组或词族中各个个体之间的语音亲缘关系。……在分析多个同源词的语音关系时，只能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②

陈建初认为：“在语音上，同源的词一般具有相同相似的语言结构，这符合汉民族认知心理的特点，也符合汉语的实际。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变化也是多轨迹的。……那么，按照现阶段音韵学研究所提供的古音系统及其音变模式来衡量同源词的语音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同源词之间不一定音同音近。”^③

鉴于此，一些学者着手探索词语同源派生的音转规律，主要有孟蓬生的《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其中对同源词的声转关系和韵转关系进行了考察；一些学者提出了判定同源词的语音关系要研究上古方音。王凤阳先生提出“汉语内部的方言对汉语史和汉语词源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方言与词源这两个边缘学科能结合起来”。^④汪启明的意见也值得重视，他说：“方音史的研究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假如除了现在的综合音外，能够扎扎实实地把齐语、楚语、吴语、秦语、晋语韵谱做出来，再把重合的部分作为华夏先秦时期文学语言的音系，那就离真理不远了”。^⑤

由上可知，“音近”的说法是模糊的，“音近”判定的依据——人为构拟的上古音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词语派生的多层多向性，存在音远义通的可能，因此，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关系用“音转”描述更为合理和客观。

“义通”之“义”指什么？“义通”的内涵为何？我们如何把握“义通”，成为当今词源研究者探讨的主要话题。

①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3、27页。

② 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141页。

③ 陈建初：《汉语语源研究的文化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④ 王凤阳：《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第109页。

⑤ 汪启明：《古合韵评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00，第300页。

王宁先生揭示了掌握义通标准的两个误区，“一是把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汉语的造词理据混同；另一个是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混同”^①。为了说明词源意义在认识上的构成过程，王宁先生和黄易青以“意象”说明词源意义：“这种经过认识高度归纳抽象之后的形象理解就是‘意象’。‘意象’是就人的认识而言；进入语言，蕴含、积淀为语义的一个成素，就是词源意义。”^②

苏宝荣先生也有类似观点：“词的深层隐含义，即词所表示的某一对象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是词高度抽象、升华后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构成词的深层隐含义的义素，我们称之为隐义素。”“隐义素相同的词构成同源词。”^③

词源学范畴的“意义”和词汇学范畴的“意义”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将同源词“义通”之“义”确定为“词源意义”，可以说将同源词研究引入了科学的轨道。鉴于词源意义的隐性特征，一些学者从词义演变规律中探求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

陆宗达、王宁先生提出运用引申规律研究义通的方法和理论。“引申是词义运动的基本形式，同源和多义是词义引申的两种结果，所以，同源词的义通规律和多义词的引申规律是一致的。”^④

王凤阳先生认为超越模糊的“义通”“义近”的主观领域，进入词义演变的类型与途径的客观归纳，是“当务之急”。为了避免因词义的多向性带来的想象的随意性，王凤阳先生对词义演变的类型与途径进行了客观地归纳，将之分为“相近关系”和“相关关系”两大类，其中又细分出二十一小类。^⑤它使词源追溯和词源系联有了一定的章程可循，不至于使联想任意驰骋。

任继昉论述了“同族词的孳乳”，用“类比孳乳”“分化孳乳”“转变孳乳”“抽象孳乳”“特指孳乳”“关联孳乳”六个条例来概括同源词的孳乳现象。^⑥

殷寄明认为：“语源义在书面词汇系统中表现为四种形态：义项、义

① 王宁：《关于汉语研究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② 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48、209、210页。

④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第388页。

⑤ 王凤阳：《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第87~99页。

⑥ 任继昉：《汉语语源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第87~101页。

素、‘意’、义素掺合着附加语义成分。”^①

由上可知，古人“义通”之“义”的科学内涵是词语的深层隐含意义——词源意义。而“义通”不仅指词源意义相同和相近，还指词源意义相对、相反和相关。词源意义的进一步探求，离不开对“意象”的研究，即人命名时对事物特征的理解和取意的研究。此外，当今的词源研究者也试图从词义的引申规律探讨同源词的“义通”规律。

二、汉语内部同源词的系联

词源理论的建构指导同源词的系联，大量同源词系联的实践也会为同源词理论的完善提供有效的实证依据。

同源词的系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系统系联的词典式专书，一种是局部系联的单篇论文。

（一）系统系联的词典式专书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在探讨了同源字的定义、判定标准等词源理论问题，确立了判定同源的古音标准的前提下，考释了 1029 组同源词；刘钧杰的《同源字典补》(1999)、《同源字典再补》(1999)，利用出土文字和更广泛的材料对《同源字典》进行了补正；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1997)考释了 127 组同源词；章季涛《实用同源字典》(2000)考释了 1160 组同源词，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1999)、《汉语词族续考》(2000)、《汉语词族三考》(2004)考释了 200 多个同源词词族；殷寄明的《汉语同源字词丛考》(2007)，以汉字形声字声符为线索，系联了 2000 个单字，归纳为 271 组同源词。

（二）局部系联的单篇论文

有姚荣松《上古汉语“支部”同源词证例》(1984)、汪启明和曾敏《“眠眩”同源词谱》(2002)、董莲池《央族同源词试联》(2005)等都是同源词系联的积极实践。侯占虎《利用谐声偏旁系联同源词探讨》(1990)、《同源词系联举例》(1993)、陈定方《男农辱蓐耨耨耨耨诸字同源考》(1989)、陈建初《论“溧”“慄”同源——语源研究中的认知观刍议》(1999)等。

第二节 汉语词源研究诸问题的新思考

汉语词源研究是汉语内部词与词之间同源关系的探究，这是纵深探

^① 殷寄明：《我对语源学若干问题的探讨》，《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第 25 页。